

由宋朝军事体制的弊端探寻宋朝外战弱势的根源

唐健敏

(武汉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在其存在的320年间,充满着与辽、金、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与杀戮,在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中,宋朝却总是处于弱势地位,除了经常性的惨败,还要向对方进贡惊人的巨额岁贡以购买和平。这种对外战争的软弱无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里我将透过宋朝军事体制的弊端来探寻其军事和政治上的根源。

【关键词】宋朝;军队;军事体制;政治体制

1. 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为防止出现“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新唐书》卷50《兵志》)的局面,宋朝建朝伊始就更改制度,确立以文治国、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宋朝官吏中武臣从属于文臣,宋朝重视文科的选拔,而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几乎为零。赵匡胤还任用文官担任统帅,引导整个社会贬低军人,蔑视武将埋下了军队战斗力丧失的祸根。尽管宋朝经济繁荣,由于重文轻武的社会影响,致使经济实力和文明成果难以向军事方面转化。

以文治国固然能够减少军事叛乱的机会,但面对四周虎狼环伺的严峻的边防形势,宋朝的国防犹如纸做的长城,注定无法摆脱“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被宰割局面。南宋覆灭之际,元军围临安,南宋谢太后在朝廷痛苦,要求士大夫站出来救国,说:“我朝三百年来待士大夫不薄”(《宋史·理宗谢皇后传》),但朝臣们唯有相视痛苦,具表投降。后人常引用此例,说明两宋重文轻武之失策。

宋朝在建朝时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集权。如何革除藩镇敢于对抗中央,偏袒敢于杀逐主帅的积习,成了宋太祖急需解决的中心问题。宋太祖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起精兵”的方针,以削除藩镇的政权、财

权和兵权,将全国的人力财力一概集中于中央。

虽然确因此削弱了藩镇力量,遂致天下以太平,但是,也导致了两个要命的后果,其一,地方实力无从发展,因而在外敌入侵时,无力自保,只能靠人民起而结社自保;其二,中央虽然集中了天下的人力物力,但也因为官僚监察和管理体系过于冗繁,从而导致效能低下。

2. 军法松弛和军政腐败

宋太祖自称执行军法尚严,决不姑息迁就,实际上,他的执法尚严,仅仅限于军士和普通将校。大将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贍破后蜀时犯法,经百官集议定罪,一致认为应当处死,宋太祖却特令赦免。这正是开了以法徇情的先河,终宋一代,由于对贪夫庸将的种种不法行为,十分纵容宽贷,故违法犯禁的事便层出不穷。宋朝虽然制订了颇严的军法,因执法或废或弛,不能不严重地损伤军队的战斗力。

宋朝的武将贪财黷货和兼并土地成风,不仅是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一些企图通过成为将领而捞取利益的人于是就行贿于朝廷要员以获取军权,由于被任命之前不惜借款行贿,许多将领上任时成为“债帅”,这就进一步导致将领更加疯狂的敛财聚富。武将的贪财黷货,兼并土地,固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产物,而宋廷的姑息和纵

容,也使之愈演愈烈。

宋朝军政腐败还体现在私役军事和刻剥军士。所谓“私役”,即是指非法役使军士。北宋的记录表明,私役军士的劳作范围极广,如修造地宅,伐薪烧炭,种植蔬菜,织造缎子、坐褥,做木偶戏人,刺绣,奏乐等等,堪称无所不有,也足见军政腐败的程度。宋朝文官武将私役军士,是一项长期的、普遍的、严格的、突出的军中弊政,宋廷虽三令五申的禁绝,却从来没有成效可言。大量役使军士,搞得军队乌烟瘴气,疏于训练,军不象军,军不成军,极大损伤了军队的战斗力。

文官武将还经常通过克扣钱粮、私放军债、买工、差使营运等方式刻剥军士。军士的地位极为低贱,生活也没有保障,文官武将只把军士作为自己发财的工具而任意使唤、极力刻剥,既损害军队士气和战斗力,还造成了十分尖锐的官兵矛盾。

3. “将从中御”的军事指挥和“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对武将的防范猜忌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即使将帅带兵在外作战,朝廷也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钳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皇帝身居离战场千里之外的朝廷,却不顾前方敌情和战况

的实际情况，绘制战图或起拟所谓的“锦囊”送于前线指挥作战，且要求不容有任何变通余地。不但导致前线屡战屡败，而且还成为庸将们推卸覆军和丧师的罪责的借口。即使皇帝偶尔委以全权，也是授权与一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文官或宦官主持军事，失利自然无法避免。

北宋的“将从中御”，主要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箝指；而南宋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由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四个权臣掌政，故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对对将权的贬抑和束缚。在中国封建时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朝的军事战略可以用“消极防御”四个字加以概括，消极防御也和将从中御一样，事实上是对武将疑忌和防范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不愿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灭敌军。与辽、西夏、和金相比，宋军数量上远胜对手，却极少能取胜，不能集中兵力，缺乏统一指挥是一个重要原因。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也是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无论大小城池，不管重要与否，皆派驻兵力防守，往往导致一些重要战略要地的轻易失手。

由于这种传统战略的影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的重要原因。

4.在抱残守缺、议和苟安传统国策下外战软弱的必然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相互发生影响的。宋朝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是很多方面的，前面讲到的军中各种积弊，很多即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而抱残守缺、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则决定了宋朝军事力量软弱以及对外战争无能的必然性。

宋朝在对外战争过程中多次与敌国签订和约，以此换来了相当时期的和平。然而统治者却并没有利用这段时间总结教训，重整军备以利再战，宋朝处理和战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应战，战而后和，和而后安，根本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打算。即使在战争的某一时期占据优势，首先考虑的也是主动求和，以大量的岁贡换取短暂的安逸。在这种传统国策的影响下，和议往往招致军备废弛，军力减弱。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隆兴和

议后，宋孝宗、虞允文等曾刻意整军经武，但因官僚军事机构的腐化已经积重难返，成效甚微。

赵匡胤在先主尸骨未寒之时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政权，在他心里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时刻提防着赵氏皇权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保守的心理让宋太祖花了很多心血进行对内防范，但他却并不打算与辽议和。至宋太宗，更加注重防内而疏于防外，苟且偷安、抱残守缺的战略心理尤其明显。即便如此，如果后来的继任者们哪怕能有一位雄才大略、开拓进取的皇帝，以中原大地物产之丰饶，汉族文明之发达，宋朝的命运或许能够改变，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一个一代雄主始终没有出现，反倒是一个比一个更保守，更昏庸，到中后期颓势已经无法挽回，直至三百二十年基业在“积弊积弱”的政权体系下最终灰飞湮灭。

参考文献：

- [1]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
- [2]袁景，罗真：《浴血年代——宋朝战争故事探秘》，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
- [3]郑岩：《宋朝十讲》，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
- [4]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

责编、校对/云岫

（上接第61页）这不仅便于政府收集决策信息，而且能保证决策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建设项目要向社会公布，让社会公众发表意见和建议。同时，建立听证制度，吸纳各方利益的代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使公共决策更加合理。此外，还可以是建立公益诉讼等制度强化社会公众监督。

3.4 强化自我监督和审计监督。合理的财政分权不仅是地方债券发行的前提，也是约束政府行为的手段。一旦明确地方政府对债券债务独立承担责任，地方政府也就明确了“应做什么”和“怎么做”，这在一定程度

上能排除中央政府承担发债“兜底”责任的可能。因此。建立地方债制度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一是合理确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除尽快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外，应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边界，做到谁受益，谁支出，消除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心理。

此外，还可以考虑加强地位相对独立的审计部门的监督作用。使其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购销、偿还过程及其用途、效益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审计监督，以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

实现地方公债的目标。而地方政府在债券收入的使用过程中必须定期发布审计报告以供投资者监督。

参考文献：

- [1][美]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 [2]王锐,张韶华,黎惠民:从美日经验看地方政府债务制度.经济问题,2004(5).
- [3]谷茵,王振海:法国地方财政析论.财政与税务,2004(1).
- [4]焦瑾璞,孙玉琦: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7.

责编、校对/云岫